

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的人民性及其意义

王 昌 忠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

摘 要:立足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时代主题,文艺人民性是七月派在抗战时期提出并阐述的重要文艺思想。作为七月派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七月派诗歌有效、严格地践行、落实了七月派的文艺人民性思想。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的人民性,体现在题材对象的人民性、主题内涵的人民性、策略技艺的人民性和美学风格的人民性诸多方面。七月派诗歌的人民性,一方面与抗战背景下文艺话语所普遍具有的人民性达成了一致,另一方面又显示了自身的独特性。人民性,是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认识论意义和美学价值的充分体现。

关键词: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人民性;意义独特性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1-0027-12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103

七月派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文学流派。七月派重视理论建设,提出有明确的理论主张、纲领要求。文艺人民性思想是七月派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七月派文艺理论中占据关键位置,起着引领作用。文艺人民性既有通约普泛性又有历史具体性,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抗战时期,七月派的文艺人民性思想一方面保持着文艺人民性一以贯之的共性特征,另一方面又立足民族独立、国家救亡的时代主题显示了独特性、差异性。文艺理论立足文艺实践又作用于文艺实践,两者存在着积极的共生互动关系。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接受着同期七月派文艺人民性思想的指导、规约,也验证、反映着同期七月派文艺人民性思想。文艺人民性“从根本意义上说是……艺术家的创作与人民的关系”“其核心所在是如何表现人民的形象,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给他们以什么历史地位,使创作出的作品与他们发生怎样的关系,等等,即作品的社会倾向上有多大程度是人民的”^[1]。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的人民性,无论是与抗战时期其他文艺派别的人民性的共通性还是自身的独特性,都体现在题材对象、主题内涵、策略技艺和美学风格诸多方面。

收稿日期:2020-10-16

作者简介:王昌忠(1974—),男,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新诗理论。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百年新诗对‘诗言志’的承传与新时代审美意识建构研究”(20BZW164);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战大后方文学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16ZDA191);2018年度重庆师范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七月派文艺人民性思想的诗歌实践研究”(18XWB024)。

一、题材对象的人民性

在文艺活动中,创作主体将社会状貌、人间万象选择、加工、处理为题材对象。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文艺话语的人民性,就实现于选择、加工、处理题材对象的过程及其结果,其中包括文艺创作者的立场、动机和策略、途径等。同时,作为社会生活的题材对象本身,也存在是否具有人民性的问题。判定、识别题材对象的人民性,不仅要与社会文化“大语境”联系起来,还要与具体的文学艺术“小语境”联系起来,而基础和前提是置身特定语境的文艺主体的人民观,也就是文艺主体对谁是人民(相应的人民的对立面是谁)、人民怎样的观点、看法。“‘人民’及‘人民性’并不是词义上自明的概念,也不是自然客观的社会存在,需要不断地提炼、重构、重塑与‘再生产’,才能让其‘获得新生’(杜赞奇),以参与到文学、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中。”^[2]诚如李祖德所指,人民并不是定于一尊的自然体而是随境而变的建构体。人民观是七月派文艺人民性思想的基础内容。着眼于抗战时期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政治使命和历史要求,在七月派那里,对于人民的具体所指,七月派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要义,那就是从“把握人民作为历史范畴的广大性和革命性的特征”^[3]来指认人民。人民一方面指有着革命可能性的受苦受难民众,另一方面指觉醒了、前进着的战斗在抵御外侮的战场上、斗争在民主运动的堡垒里的革命群众。关于“人民怎样”即人民的性状特征,在《论文艺创作底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余林强调,“人民在客观的历史要求上是一个威严而伟大的存在”,其原因在于人民具有足以成为“革命斗争和革命领导底基础”的“原始的强力”,也就是“反封建束缚的那种朴素的、自发的、也就常常是冲动性的强烈要求”^[4]²²⁵。第三,人民是现实革命斗争和政治运动的主体,人民是英雄。阿垅指出:“只有人民才是政治生活底主流。”^[5]¹⁴⁶同时,人民也尚未摆脱“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6]⁴⁷⁹。紧扣生成于抗战现实的人民观,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主要是针对以下社会状貌、生活情态抒发人民性情感、传达人民性意识的;换过来说,主要是将以下社会状貌、生活情态采集、处理、加工为人民性题材对象并以此显示其独特性的。

第一,人民生存处境和生活状况。七月派诗歌题材对象的人民性,首先就体现在七月派诗人直面人民,将人民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确立为抒情达意的对象范畴。一方面,七月派诗人以人民多灾多难的困苦生活为题材对象。艾青《北方》《手推车》、马希良《沙地吟》、鲁沙《滚车的人》、牛汉《鄂尔多斯草原》等诗篇,书写的是人民亘古、长久的普遍、广阔苦难生存状态;更多书写的则是人民当下、具体的现实苦难生命处境,如苏金伞《我们不能逃走》、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田间《给战斗者》、杜谷《巷》《写给故乡》、艾烽《江岸》等描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天蓝《G·F·木刻工作者》、雷蒙《母亲》、胡征《清明节》、化铁《请让我也来纪念我的母亲》、曾卓《母亲》等呈现的是旧中国人民遭受阶级剥削、战乱侵扰、宗法制度和封建文化奴役的悲苦生活事实。另一方面,七月派诗人将人民控诉、挣扎、反抗的生命事实、生存状况确立为了题材对象。除了像阿垅《纤夫》这样“记录”整体性的、抽象性的人民抗争苦难、捍卫生存的情形状貌的诗篇之外,更多的是“记录”人民具象、真切的现实战斗、反抗事实,其中尤以战士、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生活最多,如田间《义勇军》、侯唯动《偷袭》、庄涌《给筑路的农夫》、冀沔《旷野》、胡征《挂路灯的》、鲁藜《红的雪花》等。其他如牛汉《爱》、天蓝《G·F·木刻工作者》等表现了人民对阶级压迫、对黑暗势力的抗争、挑战。此外,在七月派诗学观念中,诗人与战士是统一的,诗歌创作与生活实践是统一的,也就是诗人及其他作家、知识分子是与人民结合在一起的,本身就是人民中的一员。因而,七月派诗歌也把诗人、作家、知识分子遭受的时代苦难及其抗争,把诗人、作家、知识分子的战斗经历、革命道路,作为人民性的题材对象加以处理、运用。辛克《我爱那一幅旗》、公木《哈喽,胡子!》、牧青《在一九四六年底恐怖中》《默悼几只捕火者的死》、牛汉《锤炼》、绿原《诗

人》等都具有这样的人民性题材。

第二,人民的内在生活即精神心理事实。人类有着异常丰富、广博的精神空间和心理内容,诸如感情、情绪、体验、感受、意识、思想、观念、欲求、意愿、意志、信仰以及下意识、潜意识等等。这样,除了物质生活、现象世界,诗歌还可以把人类精神生活、心理世界邀约为题材对象。在抗战时期,人民苦难的生存事实必然会生成苦难的生存体验、感受、认知,会滋生对苦难的怨尤、愤怒、不满,会酿就摆脱苦难的欲求、意愿;而处于抗争、战斗的生活事实之中,则必然会在内在生命中产生信念、决心、意志、信心、向往等精神、心理内容。这样,七月派诗人的视线,就游走于三、四十年代苦难中的人民、战斗中的人民的内在生命世界,把人民的心声、情感、意识、观念等捕捉为题材对象。这其中,有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反动统治的压榨、凌辱的痛苦体验、悲辛感受,以及由此而生的悲愤、控诉的情感和反抗、斗争的意愿。如苏金伞《我们不能逃走》、田间《给战斗者》《义勇军》、七月社《在七月七日》、天蓝《无题》、牧青《我愿越过墙去》、冀沅《生命》、天蓝《队长骑马去了》;有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坚韧顽强的意志、激情和决心、信念。如侯唯动《突破了围攻》、孙铤《我们还会见到》《雨》、邹荻帆《雪与村庄》、燕郊《不眠的夜星》、冀沅《渡》《今天的宣言》;有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而战斗、斗争的兴奋、激动的情绪和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的心态。如孙铤《我们在前进》、鲁藜《风雪的晚上》、卫寄宇《在星下面》、胡风《为祖国而歌》等。

第三,与人民休戚相关而为人民关切的社会现象和时代动向。人民关切的、与人民休戚相关的社会现象、时代动向,因为有利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可以达成人民性主题实现人民性动机,也是具备人民性的题材对象。鲁藜《延河散歌》、阿垅《窑洞》以抗日根据地延安的情状为题材对象,芦甸《献给朱总司令》以人民军队的领导人为题材对象,能够引起人民对抗日根据地及其领导人的认知、接受和向往,显然具有人民性。方冰《胜利的消息》、杜谷《车队》以斗争和战斗的状况为题材对象,能够使人民了解、知晓相关事实,同样具有人民性。化铁《暴风雨岸然轰轰而至》、杜谷《泥土的梦》、鲁煤《火的想望》《大地》、绿原《春雷》、牛汉《春天》以社会变革、时代动向为题材对象,能够唤醒、激励人民,也具有人民性。

第四,人民对立面、有害于人民的客体对象的存在状况。有人民,就有人民的对立面。这对立面是谁?何在?与时代政治、社会形势密切相关。以人民对立面的情状样态为书写对象,可以使人民了解、认知其反动、丑恶所在和对人民的危害所在,从而有利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显示出鲜明的人民性。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政治对立特别明显、特别尖锐,正义与非正义、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人民的对立面或曰敌人、反动派,就是日本侵略者、专制独裁腐朽没落的统治者和破坏抗日、妥协投降的消极势力。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主要把以下两类敌人、反动派的状貌情态确立为了题材对象: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残酷侵略,如田间《给战斗者》《义勇军》《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艾烽《江岸》、方然《报信者》、杜谷《巷》等;二是消极抗日的妥协者和破坏抗日的反动派的丑恶行径,如胡风《给怯懦者们》、孙铤《送讯》《行程》、曾卓《门》等。

根据上文阐述,七月派诗歌在题材对象人民性上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首先是结合时代主题对人民及其特质给予精准定位和客观指认,在看到其“原始强力”的同时,也意识到其承受的现实苦难和历史重负;其次是深入人民现场,对人民的真实情状进行立体的、细致的表现,反对纯粹为了鼓动、激励人民而改造人民生活、虚设人民生活,成就了人民的典型性;再次是将人民的内在心灵处理为题材对象,如依托出受侵略之苦、要抵抗之志的精神情状,从而避免了人民抒写的概念化、表面化、轻浅化。

二、主题内涵的人民性

主题内涵是文艺作品的灵魂和筋骨,是统摄作品内容、思想的内在力量;基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

题内涵也是支配作品艺术策略、美学风格的潜隐因素。文艺作品的主题,是创作主体对纳入文本作为题材对象的社会生活的思想情感、意识观念。文艺人民性根源于文艺主体的人民性立场和人民性动机、意图,而文艺主体的人民性立场、动机在文本中的最集中、最主要体现就在于主题内涵的人民性,也就是内含、寄寓在文本之中的思想情感、观念意识的人民性。因此,把握、考察文艺作品的人民性,也当重点把握、考察文艺作品主题内涵的人民性。方青明确指出:“文艺属于人民,而且为了人民。事实上,在任何时代,文艺和人民本来就具有着花卉和土壤的关系,两者是不可分离的。”^{[7]249}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的人民性,在主题内涵上有着充分、鲜明彰显,具体来看,主要表现为:同情、悲悯人民,忧患、焦虑人民,讴歌、赞美人民,关切、热爱人民,召唤、振奋人民,批判、控诉敌人,诗人为人民战斗、奉献的意志。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主题内涵的人民性,与同期大量文艺作品主题内涵的人民性相比,除了相似之处,还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之处。

第一,同情、悲悯人民。“战斗,是与生命在一起;生命,是与人民在一起”。^{[8]150}七月派诗人与广大人民一道处身苦难、感受苦难、体验苦难,用诗歌记录下人民的苦难生活场景、痛楚生存情状,所要表达的是对人民苦难的诚挚的同情、深切的悲悯。即胡风所说的“同情那些在黑暗社会中受迫害的人们”^{[9]705}。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A·S《沙地吟》、鲁藜《风雪的晚上》、彭燕郊《小牛犊》等是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长期承受的一般、普遍的苦难的同情、悲悯,曾卓《母亲》、化铁《请让我也来纪念我的母亲》、胡征《清明节》等是对近现代破败、凋敝、封建、战乱的黑暗现实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和悲辛的同情、悲悯,艾青《乞丐》、杜谷《写给故乡》、牛汉《鄂尔多斯草原》等是对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引发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的同情、悲悯;郑思《秩序》、绿原《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等是对人民在反动、没落、残暴统治下的不幸和苦难的同情、悲悯。

第二,忧患、焦虑人民。对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的不幸,对现实的残酷、惨烈,七月派有着清醒认知、全面了解。这使得七月派诗歌的一个主题指向,便是为人民忧患、为人民焦虑。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杜谷《寒冷的日子》等,是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遭受“寒冷”“封锁”、遭受“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的“苦难与灾难”(《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忧虑、担心。写道:“温暖的季节呀/为什么还不快来”(《寒冷的日子》);阿垅《纤夫》、艾青《手推车》等,是对“污黑而又猥琐的/灰黑的木头处处蛀蚀着”的“古老而又破漏的船”一样伤痕累累的中华民族“快要在这宽阔的江面上躺下来睡觉了”(《纤夫》)的忧患,对“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彻响着/北国人民的悲哀”的“手推车”(《手推车》)一样负重前行的中国人民的焦灼;杜谷《写给故乡》、彭燕郊《岁寒》、牧明《祖国》等则是对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企求摆脱外敌凌侮、内政践踏而不得的忧患、焦虑:“太阳已经死去/我的战斗的兄弟/倒在从背后射来的枪声里……”(《写给故乡》);“同中国的严寒奋斗/看我们忍受着/多大的痛苦呵……残忍地走着,走着/这破烂的一群/这充满了伤风,感冒/断续不息的咳嗽的一群呵……”(《岁寒》);“爬起了/跌倒/爬起了/又跌倒/向着东方的天空/高伸着/鲜血淋漓的/一只巨大的手臂……”(《祖国》)。

第三,讴歌、赞美人民。每当打击降临、不幸来到,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不是屈服、妥协,而是挺起脊梁进行艰苦卓绝的挑战、抗争,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劲的意志力。抗战时期的七月派诗歌,讴歌、赞美人民喷薄而出的强烈人民性。阿垅《纤夫》、艾青《北方》、A·S《沙地吟》、鲁煤《默悼几只扑火者的死》等诗篇便是对自古以来就蕴蓄在中华民族深处的抗争苦难、挑战艰辛的生命姿态和精神秉性的赞颂。如阿垅在《纤夫》里对象征忍辱负重的中华民族艰难前行的“纤夫”饱含深情的赞美:“一寸的前进是一寸的胜利啊,/以一寸的力/人底力和群底力/直迫近了一寸/那一轮赤赤地炽火火爆的清晨的太阳!”当然,在抗战时期,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除了长期以来的封建压迫、阶级剥削,最直接、主要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政权的统治。因而,中国人民反抗的对象就是日本帝国主

义的侵略、反动政权的统治,斗争的目标即民族独立、社会解放。这样,七月派诗歌赞美、歌颂的笔头主要也就落在争取民族独立、社会解放的斗争、战斗、牺牲、运动及胜利中了。阿垅《窑洞》、鲁藜《延河散歌》、冀沅《旷野》、杨令《繁华的夜》是对根据地人民战斗生活的赞美,鲁藜《红的雪花》、方然《邓正死了》、冀沅《死》、孙铤《挂彩者》、A·S《他,受伤了》、田间《“烧掉旧的,盖新的……”》是对人民付出、流血以致牺牲的歌颂;方然《报信者》、杜谷《车队》、胡征《打水人》《钟声》《挂路灯的》、胡征《钢板工作者》、冀沅《跃动的夜》、钟瑄《我是初来的》、庄涌《给筑路的农夫》、朱健《早晨,我开始写诗》是对战斗行为、斗争表现的歌颂,苏金伞《我们不能逃走》、辛克《我爱那一面旗》、牛汉《鄂尔多斯草原》是对战斗要求、斗争意志的歌颂,阿垅《从南到北的巡礼》、公木《哈喽,胡子!》是对革命精神、战斗品质的歌颂,化铁《解放》是对革命胜利的歌颂,等等。

第四,热爱、关切人民。诗歌以抒情言志为功能本位。在人类感情中,爱和恨最普遍、最基础。七月派诗歌在根本上涵纳的都是对人民的热爱。不过,在不少七月派诗歌中,诗人情不能自己,也直接表达着对人民的爱,对人民存生的家园、祖国的爱。以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假如我是一只鸟》等为典型的诗歌,表达的是对悲苦中控诉的人民、遭受践踏中抗争的土地、伤痕累累中挣扎的祖国的深沉的爱、焦灼的爱:“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假如我是一只鸟》),其他如白莎《冬天》、鲁沙《滚车的人》、牛汉《落雪的夜》等也表达了如是爱意。彭燕郊《怀厦门》、杜谷《写给故乡》、牛汉《爱》等诗歌,表达的则是对故土、母亲的爱,如杜谷《写给故乡》对于故土的爱表达得强烈、炽热:“血迹斑斑的/祖国东部的原野呵/我怀念你”。彭燕郊《雪天》、阿垅《哨》、鲁藜《风雪的晚上》表达的是对战斗中的祖国、人民的热爱,如彭燕郊《雪天》洋溢的便是“祖国呵/我爱你/今天的艰苦的战斗……”这一情感。

第五,召唤(动员)、振奋(鼓舞)人民。文学艺术要有独立自主性,更要有现实功利性。尤其在外敌入侵、内政动荡的抗战时期,文学艺术的现实功利要求就更显必要、迫切。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文学艺术能做的,就是以审美的方式服务、配合以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主要内容的现实政治斗争,具体说来就是鼓舞、激励人民的斗争热情、意愿和勇气、信心,召唤、动员人民投身、参与到抗日战争、民主运动的时代洪流之中。七月派对于非常时代文学艺术的价值功能直言不讳,那就是“使他们(民众——引者注)能够有力量起来参加抗战”^{[10]535}。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性存在,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七月派的回答是给予人民以精神力量:“文艺活动底最后归着点是在创作成果如何,也就是对于民众的精神的力量如何。”^{[11]41-42}七月派诗歌顺时应事,主要通过两个维度落实了这一文学要求。一种是将民族、国家、人民的灾难展显出来,从而召唤、动员包括诗人在内的人民大众投身抗日救国、民主斗争,以争取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伟大胜利。孙铤《行程》、田间《给战斗者》《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侯唯动《突破了围攻》、七月社《在七月七日》、邹荻帆《雪与村庄》、胡风《为祖国而歌》、冀沅《渡》等在诗篇中召唤、动员的是人民为抗战而战、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战,徐放《在动乱的城记》、绿原《复仇的哲学》召唤、动员的是人民为民主而斗争、为社会解放而战斗。另外一种是将战斗和斗争的实际情形展显出来,激励人民战斗的决心意志,鼓舞人民斗争的信心热情。比如,化铁《暴雨雨岸然轰轰而至》、杜谷《泥土的梦》、鲁煤《火的想望》《大地》、绿原《春雷》是在对时代、社会变革、前进的反映中激励、鼓舞人民的,孙铤《迎着初夏》、方冰《胜利的消息》《你们》、艾漠《自己的催眠》、鲁沙《歌》是在对具体战斗情形、斗争场景以及胜利状况的呈现中激励、鼓舞人民的。

第六,揭露、批判敌人。抗战时期民族的灾难、社会的悲剧、人民的困苦,来自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残酷蹂躏、恣意践踏,来自于反动统治的专制残暴、倒行逆施,也来自抱残守缺的腐朽势力。他们即这一时代人民的敌人、人民的对立面。七月派诗歌,必然要把揭露敌人的罪恶行径、批判敌人的反

动本质,确立为重要的思想主题。立足社会现实和时代使命,七月派诗歌批判、揭露的对象主要有: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侵略、践踏、掠夺,如苏金伞《我们不能逃走》、胡风《给怯懦者们》、田间《给战斗者》、杜谷《巷》等;国内破坏、背叛抗日的消极、反动势力,如曾卓《门》、孙铤《送讯》等;反动政府的独裁、专制统治和对人民的压迫、残害,如阿垅《写于悲愤的城》《去国》、冀沅《罪人不在这里》(反动统治)、郑思《秩序》等。

第七,诗人为人民奉献、牺牲、战斗的情怀、要求、意志。诗歌有着强烈主体性,其中的“抒情者”“我”总是给人留下就是诗歌写作者本人的印象。在七月派人民观中,创作与生活是一致的、诗人与战士是一致的。因此,诗人经由与人民的结合而“人民化”,成为人民中的一员。这样,诗人就要作为人民中的一员投身、参与到人民的事业中去。大量七月派诗歌都将表达诗人自身投身战斗、参与斗争的情怀、要求、意志确立为了诗歌的重要主题内涵。无疑,这也是七月派诗歌主题的人民性的体现。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中有着这样的人民性指向的主题类型主要包括:其一,表达与人民结合、汇入人民的事业的诉求、意愿。如阿垅《琴的献祭》、杜谷《写给故乡》、绿原《憎恨》、芦甸《沉默的竖琴》《大海中的一滴水》、鲁煤《我愿越过墙去》《一条小河的三部曲》、罗洛《我知道风的方向》、天蓝《无题》、彭燕郊《冬青只是在开花》、又然《女人之子》等。其二,表达同敌人、反动派斗争的决心、意志。如孙铤《雨》、冀沅《生命》《今天的宣言》、雷蒙《母亲》、艾漠《跃进》等。其三,表达为人民奉献、牺牲的信念、情怀。如鲁藜《泥土》《草》、徐放《在动乱的城记》等。

七月派诗歌的人民性思想内涵,有着同期人民性诗歌的民族指向、人道指向、进步指向、革命指向,然而不同的是,它不是仅有其中的一种而是将几者融汇、交织在了一起。同时,七月派诗歌的人民性思想意涵,与政治文化、时代现实紧密关联,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性,但与同期以及此后的阶级性指向的人民性,有着明确区分。此外,七月派诗歌的人民性意涵,具体落实为歌颂、赞美人民和唤醒、启发人民两个方面。比起只是赞美、讴歌人民的“光明”,七月派诗歌的人民性意涵更符合抗战时期人民的实情,更有利于人民为主体的抗战事业;比起一味暴露、揭示人民的“黑暗”,七月派诗歌的人民性意涵更顺应鼓舞、激励人民投身抗战的现实需要。

三、策略技艺的人民性

人民性的策略技艺、美学特质,指的是人民惯于接受、易于理解、乐于欣赏的策略技艺、美学特质,它不仅服务、配合于人民性思想内容的传达,而且本身也能给人民以艺术享受、精神愉悦。抗战时期,担负着服务、配合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历史使命,七月派文学以人民性为核心诉求:“文艺属于人民,而且为了人民。事实上,……文艺和人民本来就具有着花卉和土壤的关系,两者是不可分离的。”^{[7]249}对于文艺的人民性,除了思想内容方面,七月派在策略技艺上也有着明确诉求:“文艺底问题不仅仅是‘写什么’,同时也是和‘怎样写’一同存在的……如果他没有写出内容,没有能够在表现力上说服读者,感动读者,只是主观上兴奋一阵,那他底努力将毫无收获。”^{[12]4}。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策略技艺的人民性在诗歌形式(文体)、语言、创作原则、表现手法等维度都体现出了自身的鲜明特色。

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对于诗歌形式人民性的追求,集中反映为对新诗自由体形式的用心利用、经营。七月派诗歌主张诗歌形式的自由、散文化,一是为了人民性的思想内容能够自由、不受形式束缚地反映、传达,从而有效、充分实现战斗动员、政治鼓舞的历史要求;二是为了继承并拓展以形式自由为外在标识的新诗业已累积的诗艺准则、诗性特点;三是为了在利用、改造旧形式的民歌化、民间化大潮之外,着力于从捍卫、维护新诗的纯正性、世界性角度践行新诗形式的散文化品质。这样,七月派诗歌形

式、文体的自由化、散文化,既满足了落实诗歌思想内容人民性的需要,也是形式自身人民性的体现。整体来看,七月派诗歌属于形式上自由度较大、散文化程度较高和无文体规律性、一致性的新诗类型。无论是节与节之间,还是句与句之间,七月派诗歌一般都不注重整齐、对称,既不追求整齐划一也不讲究参差错落,完全顺着思想情感的移行、流动而相应安排。比如,阿垅的著名诗篇《纤夫》,每节的句数不同,各节内每句的字数不仅不同也没有形成一定的规律,同时节与节之间的句式排列也无相似性、对应性,没有任何所谓视觉上的“建筑美”可言。《纤夫》的一、二节的形式结构是这样的:

嘉陵江	伸出枯僵成生铁的老手随便拉住行人(不让再走了)
风,顽固地逆吹着	要你听完那永不会完的破落的独白,
江水,狂荡地逆流着,	江水,是一支生吃活人的卅字旗麾下的钢甲
而那大木船	军队
衰弱而又懒惰	集中攻袭一个据点
沉湎而又笨重,	要给它尽兴的毁灭
而那纤夫们	而不让它有一步的移动!
正面着逆吹的风	但是纤夫们既逆着那
正面着逆流的江水	逆吹的风
在三百尺远的一条纤绳之前	更逆着那逆流的江水。
又大大地——跨出了一寸的脚步! ……	
风,是一个绝望于街头的老人	

当然,不同的七月派诗人,特别是像艾青、田间这样成熟的七月派诗人,又各自在诗歌形式上显示了个性化特征。艾青诗歌运用有规律的排比、复沓,造成一种变化中的统一,对应于情感内涵的沉郁、厚重、饱满。这一诗体形式,不仅在《向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长诗中得到鲜明体现,即便通过《我爱这土地》这样的短诗也能看出。

假如我是一只鸟,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田间诗歌篇幅较长、句式较短、标点较多,在短小局促的诗句中偶尔夹杂连贯繁复的长句,与战斗的意志、愤怒的控诉、急切的欲求相统一。《给战斗者》《“烧掉旧的,盖新的……”》是田间这类诗篇的典型。下面这样的段落遍布《给战斗者》全诗:

七月,
我们
起来了,
呼啸的河流呵,叛变的土地呵,暴烈的火焰呵
和应该激动在这凄惨的殖民地上的
复活的
歌呵!

“诗到语言为止”,对于诗歌来说,无论是思想内容、诗情诗意还是艺术形式、审美特征,最终都归结于语言文字的组织、排列和化约、结合。从接受角度看,诗歌人民性的基础和前提是诗歌语言的人民性,

“以人民的语言为语言,说话要人民听得懂,写文章要人民看得懂”^{[13]196}。人民性的诗歌语言,就是人民的语言,就是人民能认识、读得懂、会理解的语言。当然,人民性的语言并非指单向度地投合、屈就人民的语言,而主要指忠于诗歌本质并在引导、教育人民的基础上的被人民认识、懂得、理解的语言。中国新诗区别于古典诗歌的主要外在表征即以现代汉语为语言形态。抗战时期,七月派诗人将创作视线投向多灾多难、挣扎搏斗的中华大地上,坚持创作和生活的统一、诗与人的统一,弃绝生涩拗口的西化语言、古化语言,也弃绝过于直白、通俗的世俗俚语、白话口语,采用纯正、严肃的综合了多种语言要素的书面化的现代汉语,既真实地“记录”了社会现实、生命状态,也捍卫了中国新诗(现代汉语诗歌)应有的尊严和发展路向。“腥风里/带来了温柔的黎明/带来了春的彩色/——把生命放在春的节奏里/把骨肉在弹花中化成泥……”(辛克《我爱那一幅旗》)、“野花生长在荆棘里/好像理想活在监狱……野花要结实/我们的理想就要开花”(鲁藜《延河散歌》)等七月派诗歌语言,不仅是对抗战时期特定事实的有效“命名”,而且清晰晓畅、生动优美,馥郁、酿就出浓郁的诗意。

抗战时期,民族矛盾、社会斗争紧张、激烈到了白热化程度。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都不得不纳入抗战救国、民族解放的现实主题之中。因而在创作原则、手法上,抗战时期的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只能是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手法,正是抗战时期文艺创作原则、手法的人民性的鲜明、直接体现。七月派诗歌忠实于现实主义原则、践行着现实主义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中国新诗潮流推向了新的高度。通过前文分析不难看出,抗战时期的七月派诗歌为了“把中国和他底人民推向这神圣底民族革命战争的疆场……再把中国和他底人民唤醒”^{[14]14},从而“承担了为祖国而歌、为抗战而歌的历史任务”^{[15]前言,1},其创作立场、意图动机、题材对象、思想内容、策略技艺,都彰显出鲜明、直接的现实主义特色。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在语象采集、运用上也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如土地、风雪、战士、马、枪弹、旗帜、号角以及战争场面、战斗情形等诗歌形象直接搬移、转运至多灾多难、烽火连天的战时社会场域。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的语言与形象存在的是直接的语义对应关系,而少有暗示、隐喻、象征关系,即便存在象征关系,也只是浅度象征、单一象征关系而非多重、深度象征关系。比如,“泥土从深沉的梦里醒来/慢慢睁开晶莹黑亮的大眼/它眼里充满了喜悦的泪水/看,我们的泥土怀孕了”(杜谷《泥土》)。“江潮年年愤怒地号唱/但唱不尽人民心头的积恨/水流日夜奔浮着/而洗不净烙在/人民心头的血印呀”(艾烽《江岸》)。通过拟人、隐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而具备了象征意义,但其中的象征关系简单、直接,意义指涉明确、具体。这样,既使诗歌诗意葱茏、诗情饱满,又不至于过于晦涩、含混以至于超出了抗战时期人民的接受能力、感知能力,从而丧失直面抗战现实的价值。

在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尖锐、激烈的抗战时期,大量文艺作品政治层面的人民性强于艺术层面的人民性。七月派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把配合、服务现实政治任务视为首要、根本使命的同时,并没有轻视文学自身的独立性、本位性和自主性。七月派强调创作主体的“主观战斗精神”,看重创作主体的“主观精神”“战斗要求”和“人格力量”。对于当时较为普遍的客观主义、公式主义创作倾向,七月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缺乏和人民结合的诚意,歪曲了和人民结合这一要求底实质”^{[5]220}。七月派将诗指认为“作家在现实这个火石上面碰出的自己底心花”^{[11]42},要求诗人主体以强大的“主观精神”“突入”“拥抱”生活,在诗歌中“主观”表现诗人饱满的感情和炽热的情绪。另一方面,七月诗派反对“廉价地发泄感情或传达政治任务”的“公式化”倾向,提倡诗人的思想感情和感觉意绪都要借助具体可感的生活形象加以传达和展现。“思想概念是好的,但在文学上要有诚心有能力和生活结合,和感觉结合,和形象结合”^{[16]54}，“它(形象——引者注)是情绪底大的蒸腾,它是思想底大的拥抱”“形象,不仅仅是要把那个说不出的说出来,而且要说得更多,而且要暗示得——更多更多”^{[17]200}，“诗的生命是诗人底情感与理智底形象化”^{[18]282}等命题对形象在诗歌中的价值、意义作了建设性阐发。事实表明,七月派诗歌情感性和

形象性相结合的表现手段和方式,既维护了现实主义诗歌的艺术本质,给予人民以诗歌艺术应有的审美愉悦,又通过感染人民情感、启迪人民心灵而起到战斗召唤、政治动员的作用,从而彰显出人民性价值功能。

总之,七月派诗歌在策略技艺方面的人民性,无论是语言、形式还是创作手法、原则以及语象选择,都维护着自身的独特性。七月派诗歌是践行七月派文艺大众化思想的产物。七月派的大众化是“有限度”和“有条件”的大众化,而非极端民粹主义的民间化、民族化。七月诗派拒绝那些暂存于民间的糟粕性民间文艺,也排斥机械套用民间形式和手段,而努力尝试适宜人民需求的新形式、新手段。七月派诗歌注重话语样态的形象性、语象建构的形象性,自觉抵制同期较为流行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客观主义。不言而喻,与形式主义的人民化策略和裁剪于政治报告、文件的人民化技艺,七月派诗歌的人民性策略技艺要更合理、科学。

四、美学风格的人民性

文艺的人民性是由文学艺术整体或者说文学艺术的各个组件、各种要素共同完成、实现的;而且,本质性和根本性的,应该是由确立文学艺术之为文学艺术的本位性、本体性组件、要素来完成、实现。文学艺术得以与其他意识形态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在于文学艺术是审美的。文学艺术是创作主体按照“美的规律”打造的“美的对象”,通过其“美的条件”(美的品质、特性)与人以美的体验、美的享受实现其审美功能。这样,艺术品质、审美特点或者说美学风格,于文学艺术而言就是本位性要素、本体性构件。“七月诗人始终重视诗的教化功能,强调诗的功利性。始终把价值理想放在人生首位。”^[19]抗战时期,七月派诗人固然高度重视思想内容的政治性,也将服务现实斗争、配合政治运动视为诗歌书写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职责。但七月派诗人并不忽视诗意建构、诗美打造、诗质生成,也就是并不忽视诗歌艺术品质的经营、美学风格的造就。艾青在七月同人的座谈会明确提出“宣传与文学是不能混在一起说的”“对宣传和文学……文学的作用应该更高,影响也更深刻”^{[20]529}。抗战时期七月诗派所追求的人民性,既体现在诗歌的思想内容上,也反映在诗歌的艺术品质、美学风格上。七月派诗歌对于审美品质的人民性的注重,以及七月派诗歌审美品质的人民性的显著特色,是其区别于同期大量诗歌样态的重要标识。

雅与俗是一对用来衡量、评判文艺作品艺术特征和美学色彩的重要指标。雅,即高雅、文雅、风雅,一般指的是庄重、端正、严肃、纯粹、崇高的艺术境界、美学格调。雅的极端是曲高和寡,是孤芳自赏,其后果是脱离普通接受者、脱离一般群众从而丧失人民性。俗,即通俗、凡俗、世俗,一般指的是浅显、平易、亲近、随和、与日常生活近距离的艺术境界、美学格调。俗的文艺作品以平民大众易于掌握、习惯接受的方式、手段反映、表现平民大众的生活状貌,营造平民、百姓趣味的艺术特点、美学风格。俗的极端是低俗、粗俗、庸俗、恶俗,由于它们于艺术无益、对人民有害,自然也就丧失了人民性。抗战时期,唤醒民众、激励民众,动员和鼓舞民众投身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历史洪流,是文学艺术的神圣使命。文学艺术面向和针对广大民众,为广大民众书写、书写广大民众。另一方面,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长期置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肉体和精神饱受奴役和伤害,文化水平低下、艺术修养贫乏。这两方面使得俗必然会成为本时期文艺作品艺术风格、美学特质的人民性的基本特质。

抗战时期的七月诗派也在美学风貌上选择了俗。在书写对象上,七月派诗歌回避了风花雪月、王公贵族,也回避了幽思玄想、形上哲学,而采集着平民百姓、劳苦大众受苦受难与挣扎反抗的现实生活;在语言、形式上,七月派诗歌采用通俗易懂、纯正明白、标准规范的现代汉语和自由诗体;在手法策略上,七

月派诗歌着力打造可感知有着生活质感和实感的形象,着力传达生发于现实世界、民众中间因而能与广大民众形成共鸣、产生呼应的真切、饱满情感。需要指出的是,抗战时期七月诗派对诗歌的俗掌握着理性、清醒的分寸,那就是坚执通俗、平俗,但拒绝、警惕庸俗、低俗、粗俗。“要提高大众文化水准,决不应降低已经达到的水准去迁就落后的读者”^{[21]534}。七月派诗歌通俗而不低俗,从满足、顺应人民的既有需要到养成、提高人民的需要,达成了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性。“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田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无论题材内容、思想意涵还是话语方式、诗情诗意,都通俗明了、平俗简易,但其展现的浓郁诗性撼人心扉、挥洒的强烈诗质动人肺腑。

中国古典文论有“气”“格”之说,它观照、界说的是文学艺术的境界、格调、气格、品位。由于气、格会对接受者产生作用、影响,所以就显现出了价值等级的差异。以服务人民、对人民有利为理由和依据,文学艺术的气、格也可以作出有无人民性的指认,也可以作出人民性程度的评定。能振奋、感染、鼓舞、激励人民精神,提升、净化人民心性,促使人民向上、向前和向善、向好并推动人民事业的气、格,必然富有人民性和人民性强;而使人民懈怠、消沉、沮丧、迷惘、失望或使人民沉溺、无聊、迷狂而丧失干劲、消退热情、趋向消极并负面影响人民生活、事业的气、格肯定缺乏人民性和人民性不足。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的人民性也体现在诗歌的气、格也就是境界、格调的人民性上。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牛汉《鄂尔多斯草原》、杜谷《巷》《写给故乡》等书写人民苦难的诗篇,其格调固然有沉重、沉郁、悲凉的一面,但其中因为有悲愤、有控诉、有挣扎、有抗争而呈现出了坚韧、倔强、昂扬、振奋、力量的一面,使得读者不是完全被悲哀吞噬、被悲悯淹没而是在悲壮、崇高的体验中获具了欣悦、兴奋,也获具了改变、扭转人民悲苦处境的信念和向往。在反映人民的战斗、斗争的诗歌中,无论是鲁藜《红的雪花》、方然《邓正死了》等以人民付出、流血以致牺牲为题材,方然《报信者》、杜谷《车队》等以战斗行为、斗争为题材,还是苏金伞《我们不能逃走》、辛克《我爱那一面旗》、牛汉《鄂尔多斯草原》等以战斗要求、斗争意志为题材,阿垅《从南到北的巡礼》、公木《哈喽,胡子!》以革命精神、战斗品质为题材,所彰显的或者是昂扬、激奋或者是雄壮、豪迈或者是壮烈、炽热或者是乐观、高亢的情感基调、境界气格,催人奋进、使人鼓舞,有力、有效地起到了动员、召唤人民的现实作用。苏金伞《我们不能逃走》、胡风《给怯懦者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侵略、践踏、掠夺,曾卓《门》、孙铤《送讯》揭露国内破坏、背叛抗日的消极、反动势力,不仅仅有由气愤、愤慨、激怒透射出来的凝重、低沉,也不仅仅有因为诅咒、发泄的施行而展现出来的舒张、坦然,更有因为揭示、批判、抨击而呈示出来的正气、浩气和英气。

诗歌的人民性,必然包括诗情、诗性和诗意的人民性;而人民性的诗情、诗性和诗意,自然是使人民产生美感即美的愉悦、美的快感的诗情、诗性和诗意。人民是有着现实客观性的客体存在,不同历史时代和社会文化环境中,人民所指不同,人民的文化水平、接受能力和审美观念有所不同。因而,何为人民性的诗情、诗性和诗意,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面向的人民是受苦受难、忍辱负重的劳苦大众,是投身民族抗战、参与社会斗争的战士群众,因而其诗情、诗性、诗意只有为这样的劳苦大众、战士群众感受到了美、体验到了美并认同、感悟到了这美,才具有人民性。七月派主张文学尽量使大众接受、尽量接受大众。抗战时期,由于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下,审美鉴赏能力不足,新诗阅读、认知薄弱和接受的新诗指导、教育欠缺,七月派诗歌只能打造、提供人民易于、乐于、惯于接受、体认到的美的诗情、诗性和诗意。正因为如此,七月派诗歌的诗情单纯而不含混,诗性明净而不晦涩,诗意晓畅而不阻滞。

很大程度上,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的政治属性、现实功能,是经由艺术性达成、实现的;或者说,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是以艺术性即艺术品质、美学风格为途径、渠道实现、达成政治性、政治实用功能的。相

较于忽视审美意图的“政治化写作”，七月派诗歌审美风格的人民性，便拥有了合法性前提。就审美风格的人民性而言，其独特性主要在于：在俗方面，通俗、平俗但不低俗、粗俗，从而既适应人民的接受水平又改善人民的欣赏趣味；在气格、境界上面，既捕捉苦难时代的真实氛围、气息，又积极、“正能量”地升华、引导，从而具备历史真实性和艺术合理性；在诗性品质上，既注重诗意营造，以将诗当作“诗”来写（而非口号化、标语化的政治读物生产），又立足人民群众的欣赏口味和接受能力。

[参 考 文 献]

- [1] 王向峰. 论人民性的历史发展与现实意义[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3).
- [2] 李祖德. “人民性”与“人民国家”主体想象——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话语历史考察之一[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4).
- [3] 严昭柱. 关于文艺人民性的思考[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5(6).
- [4] 余林. 论文艺创作底几个基本问题[G]//张传敏编校. 七月派文献汇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 [5] 阿垅. 我们今天需要政治内容, 不是技巧[G]//张传敏编校. 七月派文献汇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 [6] 胡风. 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G]//张传敏编校. 七月派文献汇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 [7] 方青. 文代会底思想要求[G]//张传敏编校. 七月派文献汇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 [8] 方然. 释“战斗要求”[G]//张传敏编校. 七月派文献汇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 [9] 胡风. 关于《七月》和《希望》的答问[G]//张传敏编校. 七月派文献汇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 [10] 吴组缃. 座谈会记录[G]//张传敏编校. 七月派文献汇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 [11] 胡风. 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对于文艺发展动态的一个考察提纲[G]//张传敏编校. 七月派文献汇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 [12] 胡风. 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G]//张传敏编校. 七月派文献汇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 [13] 陈家康. 人民化[G]//张传敏编校. 七月派文献汇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 [14] 田间. 论我们时代底歌颂——一个诗歌工作者向中国诗坛的祝福[G]//张传敏编校. 七月派文献汇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 [15] 张传敏. 前言[G]//张传敏编校. 七月派文献汇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 [16] 胡风. 今天, 我们底中心问题是什么? ——其一, 关于文学与政治, 创作与生活的小感[G]//张传敏编校. 七月派文献汇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 [17] 阿垅. 技巧否定论[G]//张传敏编校. 七月派文献汇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 [18] 吕荧. 人的花朵——艾青与田间合论[G]//张传敏编校. 七月派文献汇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 [19] 吴井泉. 论七月诗派的史诗化倾向[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1).
- [20] 艾青. 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座谈会记录[G]//张传敏编校. 七月派文献汇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 [21] 绉弩. 座谈会记录(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 1938. 5. 1)[G]//张传敏编校. 七月派文献汇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Significance of July School Poetr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Wang Changzh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ra theme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national liberation, the people's character of literature and art was put forward and elaborated by July School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July School literature, July School poetry effectively and strictly practiced and implemented the people's thought of July School. 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people's nature of July School's poetry wa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people's nature of subject matter, the people's nature of theme connotation, the people's nature of strategy and skill, and the people's nature of aesthetic style. On one hand, the popular character of July School poetry wa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literature and art dis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nti-Japanese War.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wed its own uniqueness. People's nature was the full embodiment of epistem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aesthetic value of July School poetr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words: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the July school poetry; national character; uniqueness of meaning

[责任编辑:左福生]